

大文学视野下的巴金

——重读《随想录》

李 怡, 张雨童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倡的“说真话”、“无技巧”、“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正体现了巴金自觉的“大文学”追求。融历史记叙、个人见闻、思想笔记于一体的传统中国“大文学”书写,有其自觉的历史性、文献性及“为了人生”的追求,巴金《随想录》正是以“大文学”视野所完成的对历史的记录和审判、建造的个人“文革”博物馆和现代文学资料馆。只有在大文学视野下,我们才能读懂巴金《随想录》中历史之真和个人情感之真相交织的属性及意义;“大文学”不仅对巴金研究提供新角度,亦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野。

[关键词] 巴金;《随想录》;大文学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6)01-0045-07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6.01.005

关于巴金,我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是“真”,从早年创作直到“随想录”系列都是如此。^①

但问题在于,何以“真”的问题如此重要?随着历史的烟云翻滚,巴金能够感受到的“真”的价值似乎与今天的人们的思想有差距,以致已经有当代学人公开质疑这样的书写价值。随着对历史资料的披露与思考,当代学人要求的“真”,意味着对“文革”发生的体制根源以及中国政治人文环境的反思,巴金把灾难归结为“封建主义的流毒”在他们看来没有触及本质,他们认定晚年巴金相比青年巴金保守了,怯懦了:他的反思“夹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缺乏自己的独立话语”。^②“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当局给定的标高线。”^③

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有限的、止于浅表的反思,是一种有意的躲避和推卸责任。巴金对政治集权和“四人帮”的控诉,被指责是为知识分子开脱:“对政治集权如何解构了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话语权力的声讨……实质上掩盖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种历史资源的有机构成的残酷现实。”由此判断,巴金

“真”的背后的实质是“假”:“其一再被主流批评家所称道的‘讲真话’精神,也只能成为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懦弱脊梁、萎靡人格、颓唐心理的代名词。”^④

“真”成了可疑的,从“纯文学”的眼光看,巴金为突出“真”而选择的“无技巧”创作方法,也失去必要,反倒成为破坏文学艺术的坏示范:“通篇的废话唠叨,极其粗糙的词语搭配,绝少文学美感与艺术张力的行文……难道这种浅直如话的行文就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吗?难道这种消解了文学质素的写作,给现代文学提供了可资效法的艺术经验吗?”^⑤

而西方现代艺术的波诡云谲则更是意味复杂地告诉我们何谓艺术的繁复追求,与这样的追求相比较,巴金的理想似乎比较简单。

然而,所有这些质疑并不能取代我们内心深处的巴金的意义:在种种艺术理论与历史真实的概念背后,巴金及其《随想录》依然挺拔屹立,这种不可替代的庄严的存在又源于何方?我觉得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当代所谓“纯文学”、“纯艺术”概念与我

[收稿日期] 2015-10-10

[第一作者简介] 李怡(1966—),男,重庆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们固有的对文学的“需要”的根本差异问题，无论文学的概念如何演变，我们心灵深处源远流长的“需要”依然不可改变。现代中国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都愿意借用近代以后西方发展起来的“纯文学”概念，但在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中——无论中外——又都在无意识中为“杂文学”的趣味留有余地，那种融历史记叙、个人见闻、思想笔记于一体的自由书写依然散发着难以替代的魅力。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文学”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繁杂性”与“灵活性”。

更重要的在于，杂文学一大文学概念意义的文字更带有对生存的直接的表现和关怀，其中是历史与个人情感的交织。

巴金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一些追求——真与“无技巧”都与大文学的视野直接相关。

“真”属于文学与历史共同的目标。

中国文论最早对“真”的表述可以追溯到“修辞立其诚”、“闲邪存其诚”（《周易·乾卦·文言》）。“诚”，《说文解字》^⑥、《尔雅》皆释为“信也”，邢昺疏曰：“皆谓诚实不欺也”。^⑦

传统中国文学中的“诚”即“真”，表现为对现实生存的忠实记录和历史关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可见“大文学”的特性之一就是“历史”关怀：在文学中包含着对时代的记录和审判。

巴金在《随想录》中不厌其烦地倡导说真话，不仅有“说真话系列”，还将文集命名为《真话集》，其历史求“真”的属性十分明显。

在巴金“大文学”的追求中，明确把“真”作为衡量当前文学价值的最高标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躲避读者们的炯炯目光。”^⑧在巴金看来，“真”是作者和读者衡量作品的共同标准。

何以“真”超越了其他文学要素，变得如此重要？“文革”十年浩劫消除的恰恰是文学的“真”。人们起初把假话当真话说，后来把假话当假话说，大家把假话、空话当护身符，在“运动”的大神来检查“卫生”时装点门面。每次学习、批斗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预期的效果。

假话使得文坛上没有真的文学，人们根据“长官意志”炮制出“遵命文学”，这种文学可以随意变戏法，“四人帮”一下台，立刻从“反走资派”文学变为“反四人帮”文学。

“假”文学更被用来“杀”人，人民在“学习”假话中失去头脑，由人变牛，相信、传播假话：“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更在假话的狂热中“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⑨可以说，假话毁了文学，带来了“文革”。

巴金更指出，假文学带来的灾难不仅是文革，更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逆流如何能发动战争，把年轻人骗上战场成为炮灰？靠他们的假文学掩盖真相，把侵略说成是“进入”中国，为中国人谋幸福。

巴金提出，文学家的责任是把真相告诉人民，文学是时代人生的忠实记录，这就是巴金所理解的文学之“真”，也是历史所追求的“真”。

因此，巴金在《随想录》中身体力行的“真”，首先是说出真相。为了让下一代人给“文革”下结论、写历史，巴金要在《随想录》中把“四人帮”和“文革”的真实材料留给后人，他忠实记录自己经历的抄家、批斗、牛棚生活，不保留地画出大家由人变牛、由人变兽的丑态和疯态：“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⑩

其次，《随想录》之“真”还意味着对历史的探索和关怀，巴金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⑪，何以产生文革？人何以变兽？他试图通过不断“探索”，让大家“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只有弄清来龙去脉，找回自己，才不至于“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⑫才能真正阻止“文革”的发生。

由此可知，巴金的“大文学”具有历史属性，自觉承担了对时代记录和审判的功能。巴金也曾明确表示，《随想录》就是他用笔建立的文革博物馆。

博物馆最明确的作用，就是对历史的储存和展示，“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的中

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博物馆存在之意义，就在于对历史无声的批评和警示：“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③

同时，巴金的“大文学”还具有文献性。巴金一直试图带头创办现代文学资料馆，他“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④

而《随想录》的一大贡献就是怀人系列散文，巴金有意识地记下故人往事，如萧珊、丽尼、冯雪峰、老舍、黎列文、方令孺、马宗融、满涛、顾均正、胡风等。这些经巴金散文剪裁的人物真实可触，其用意正是出于“大文学”文献性的考虑。

一方面，巴金有意识记录作家友人生平和与之交往过程，为现代文学史留下珍贵回忆资料，并力求展现这些作家在文革中被歪曲了的真实面貌：“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竟是混淆不了的。”^⑤

另一方面，巴金记录了这些作家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过早结束生命的珍贵史料。如同他赞赏的《杨沫日记》一样，巴金也希望以史为鉴，让后人对作家们的遭遇有真实的了解和公正的评判：“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⑥

可以说，怀人系列散文就是巴金用笔建造的现代文学资料馆。

明白巴金《随想录》自觉的“大文学”追求，从大文学视野出发，我们才能解读属于巴金的“真”：首先，这是一种自觉承担历史记录和关怀的“真”，在假文学充斥的时代，巴金的“真”文学有医治时代病的作用；其次，这是在历史性和文献性意义上的求“真”，《随想录》是巴金用笔建造的文革博物馆和现代文学资料馆，其历史和文学价值不容低估。

明白“大文学—杂文学”是纯文学之外的“别一种文学”，有其独立的属性和追求，就不会有对巴金之“真”的误会。

当然，在中国的历史概念中，除了事实的真切，“真”还有一层含义：诚挚。

中国古代文学的“诚”，除了“信”，还有“诚挚”之意，《广韵》云：“诚，审也，敬也，信也。”^⑦《尚书》曰：“至诚感神”，都言文学来自于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其情真”，然后才能“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

在巴金的“大文学”概念中，真除了写事实，也意味着写真心，巴金坦言其写作的秘诀是把心交给读者。

同样，“文革”十年浩劫消除的不仅是真话，还有真心，正因为隐藏了真心，才不见真话：“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⑧甚至人们对自己也刻意隐藏真心，让自己成为奴在心者。这种假文学抹杀了作家和读者间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者们的信任。”^⑨

因此巴金提倡诚挚、写真心，在《随想录》中身体力行，首先是把心交给读者，坦诚表达自己的爱憎，除了对“四人帮”的憎，更有对人民的爱：“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会熄灭。究竟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这也就是我同读者的惟一的联系。”^⑩

其次，巴金认识到，十年动乱带不走的，反而支持我们活下来的，“是爱，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积极的东西。”这是保存我们民族不亡的根本，是前人希望通过我们留给后人的火种。正如文学家的责任是揭示真相，文学家的责任也是传递真情。这也是支撑巴金在耄耋之年仍坚持写作《随想录》，“如饥似渴”^⑪地喊着“我要写，我要写。……不偿清债务，我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⑫的根本原因。巴金创作《随想录》时的急迫感，来自于欠债要还的赎罪观，更来自于对传递真情的责任感：“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做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⑬

在巴金的“大文学”中，“真”是历史之真与个人情感之真的融合，恰恰是在极左政治时期，“真”被空前扭曲和淆乱。中国文学的思维“真实”被迫包裹着太多的观念和态度，属于官方认定的“真实”，这里被最大扭曲的就是个人情感的真挚性，借助“大文学”视野是回复“真”的途径。

大文学杂取多式、自然随意的写作也形成了独有的“自然技巧”，这就是巴金一直强调的“无技

巧”。

在呈现我们生存关怀的严重性的意义上，对技巧的谈论本身可能包含一种危险性，有可能会以艺术的名义掩盖甚至伤害我们表达的勇气。巴金一直对此抱有警惕，到《随想录》更为自觉。大概到晚年，历经人生磨难，更加清楚对中国人而言什么东西是至关重要的，什么东西是绚丽的浮云，所以巴金更加理直气壮地谈论和张扬“无技巧”的问题。

在巴金的“大文学”观中，文学的要义是求真，在他看来，“真”的文学不需要技巧：“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②

十年浩劫的经历让巴金明白，说话漂亮的办事却不一定漂亮，“技巧”反而是骗子惯用的伎俩，因此他宣称“无技巧”，更有一层对于“技巧”的警惕和有意远离：“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③

而在受到太多关于“无技巧”的批评之后，巴金更发现了对于“无技巧”的抵制背后的深意，抵制“无技巧”的背后是抵制直面“文革”，抵制“真”：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冥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原来都是为了“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④

因而巴金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无技巧”，为了实现“大文学”求“真”的理想，巴金自觉远离了可能妨害“真”的“技巧”。用纯文学眼光来指责巴金的“无技巧”，是没有领会巴金“大文学”的追求，正如鲁迅所说：“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

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⑤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大文学”的理念和认知时显时隐，或自觉或不太自觉，但都形成了一条始终贯通的追求，在不同作家那里体现着其不同的内容。鲁迅杂文是对流行的“艺术规范”的突破，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大文学突破纯文学规范）；当代《吴宓日记续编》属于“野史”与个人文学表述的结合，在回归文史一体的传统大文学轨道上建构自己；巴金晚年随笔则是对文学生存关怀的思想与艺术的基本原则的捍卫，从中格外突出了大文学“为了人生”的若干本质。

巴金“大文学”的另一个属性就是“为了人生”：“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⑥

在《随想录》写作的年代，“为了人生”的具体内涵就是清除“文革”流毒，何以如此？因为“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⑦何以要靠文学来战斗？因为明明曾经或正在受着文革的害，人们却不愿意提文革，过起了“瞒和骗”的人生，而在巴金看来，作家是战士，是探路人，有责任揭穿真相，肃清流毒。

因此，巴金写了“小骗子系列”号召大家不要讳疾忌医；写了“探索系列”，号召作家要“思想复杂”，探索根源。

他在《随想录》中探索发现，“四人帮”的本质就是封建流毒，“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因为“知识”会看出他们的“破绽”，文化会成为对付他们的“武器”。然而巴金又发现，对封建流毒的思考不能只指向“四人帮”，“我们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⑧

我们为什么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我们为什么甘心传播假话，变了牛，不思考，变了兽，去害人：“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⑨

至此，巴金又把反思从“我们”具体到“我”

个人，出于恐惧，“活命哲学是我当时唯一的法宝”。^②不仅在同志遭遇不幸时，“没有支持他，没有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冷眼旁观”。^③甚至为了过关，落井下石地发表违心之论。^④他甚至更深入地挖掘自己人性的残忍：“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登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⑤巴金把人性挖得这样深，正如他在1990年回忆《随想录》的写作时说：“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我就看出我是在给自己铸造武器。”^⑥巴金的这件“文学的”武器，对准“四人帮”，对准社会，也对准自己，是对大文学“为了人生”的本质的有力捍卫。

进入现代中国之后，在外来“纯文学”概念的冲击之下，有学者将这种不能为“纯文学”所涵盖的，更为繁杂多样的文字样态称为“大文学”。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最早在文学史著作中使用“大文学”概念的是谢无量，1918年他出版了《中国大文学史》，虽然这部著作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大文学”，但是从它的实际内容看，显然是为了将传统中国的各种繁杂的文字现象纳入“文学史”加以描述，作者意识到了所谓的“纯文学”概念无法清理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历史。^⑦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不时标举“纯文学”旗帜，但事实上却依然生长着多样化的文学形态，而传统中国的杂文学观念也继续产生着影响。例如现代杂文和现代日记、书信都超出了“纯文学”的认知范围，需要在“大文学”的意义上加以读解。依然留存着传统大文学（杂文学）观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日记作品，更应该放置在大文学的视野下加以解读。这样的解读，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定位模糊的文体捧进“文学”的光荣殿堂，而是在兼顾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方向上，挖掘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个性和情怀的别样的表达，解释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样式。

引入“大文学”视野，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

首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不应仅仅再以所谓“纯文学”标准来筛选作家作品，注目于纯文学虚构、想象、技巧的要素，取消或忽视“大文学”属性的书写的意义。

比如鲁迅杂文、《吴宓日记续编》、巴金晚年的《随想录》散文等，就是“大文学”书写的代表。

《吴宓日记续编》在“纯文学”的眼光看来，只能作为吴宓研究史料，然而这无疑误读了把日记视为“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的吴宓的本意。

只有意识到《吴宓日记续编》的“文学”本质，以“大文学”视野重做分析，才能看到吴宓自觉运用日记文体作为文学书写的尝试；透过晚年吴宓对思想、生存情况的记录，看到他通过文学方式对历史的自觉记录和对人生意向的有意提取，从而读出他对“文学”意义的理解和坚守。这是“大文学”视野才能提供的视角。

同样，巴金被“纯文学”眼光诟病“无技巧”的《随想录》，却是巴金晚年最重视的作品：“五卷本的《随想录》，它才是我的真实的‘日记’。它不是‘备忘录’，它是我的‘忏悔录’，我掏出自己的心，让自己看，也让别人看。”^⑧

只有运用大文学视野，我们才能读懂晚年巴金在《随想录》中倡导的“真”的含义，“无技巧”的选择，以及“为了人生”的本质，才能看到《随想录》对于巴金研究和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

“杂文学—大文学”是一种融历史记叙、个人见闻、思想笔记于一体的自由书写，是通过文学完成的对历史的记录和审判，作家有自觉的文献意识，以及对文学“为了人生”原则的捍卫。

这样的“大文学”书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而对“大文学”的认可和发现，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现曾经被我们遮蔽的意义。

其次，“纯文学”是我们从西方引入的对文学狭义的定义，意在强调文学的“审美”，而排除“致用”。

但事实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大文学”才是中国传统文学固有的概念，并且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并没有离开“大文学”存在的环境，文学现象本身仍然贮满了社会历史的内涵，文学和文学家也仍然承担着社会历史的使命。

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从国民政府北伐到北洋军阀覆灭，从“七七事变”到全面内战爆发，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动荡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生活、情感的细枝末节中。政治历史变动对文学也有直接影响：国家对于文艺的导向和管控、书报检查出版制度的调整，文人作家管理制度和生存环境的变

化，作者和读者群的流动与分化等却让文学本身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身在其中的作家也有自觉的使命感，如鲁迅所说：“我不是批评家，因此也不是艺术家……因为并非艺术家，所以并不以为艺术特别崇高，正如自己不卖膏药，便不来打拳赞药一样。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人生的记录。”^①

巴金晚年也有过相同的论调：“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惟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②

鲁迅和巴金所说的不是艺术家、文学家，即是指不是“纯文学家”，而是记录人生，“为了人生”的“大文学家”。

唯有看清中国文学的实质仍然是“大文学”，中国作家的自我认识仍然是“大文学家”，才能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质。

而海外汉学家以西方“纯文学”的概念指责中国现当代文学沾染了过多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斥为“凋零”，即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隔膜。

最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大文学”视野的发现，也必将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纯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发现。“杂文学—大文学”概念意义的文学，不仅文体杂糅，也涉及多种学科，如传统经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

如巴金《随想录》意图建立文革博物馆和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历史文献意识，《吴宓日记续编》在历史和经济史意义上的详细记录等，“大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作家创作从来就不局限于文学范围内，他们有自觉的跨学科眼光。

因而，对“大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应该有自觉的跨学科视野。

正是为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民国社会体制下独有的经济形态、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组成的对文学的发生发展有影响的“民国的文学机制”，以及相应的，完全不同形态的“共和国的文学机制”，而这正是研究“杂文学—大文学”视野下的文学必须具备的知识框架。

提出“大文学”问题，不是以此重新核定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和发展，而是揭示这一可能被长期忽略的内在元素，也不意味着未来中国文学一定沿着“大文学”的方向发展，而是提示忽略这些内在素质可能造成的问题。“大文学”问题的提出，也许不失为文学“补钙”的一种途径。

[注 释]

① 最早从“真”的角度评述、肯定《随想录》的代表性论述有：吴周文《他的整个心灵在燃烧——论巴金散文近作》，《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丹晨《“把心交给读者”——读巴金近作〈真话集〉》，《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3期；傅安《巴金〈随想录〉读后》，《当代文坛》1984年第8期；吴欢章《巴金〈随想录〉的艺术境界》，《当代文坛》1985年第10期。

② 林贤治：《巴金：一个悲剧性的存在》，《新京报》，2005-10-19。

③ 狄马：《纪念什么先于纪念——以巴金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

④ 惠雁冰：《意识形态粉饰下的平庸——巴金〈随想录〉》，《二十一世纪》，2007年12月号，总第104期。

⑤ 惠雁冰：《意识形态粉饰下的平庸——巴金〈随想录〉》，《二十一世纪》，2007年12月号，总第104期。

⑥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页。

⑦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0年版，第19页。

⑧ 巴金：《未来（说真话之五）》，《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338页。

⑨ 巴金：《未来（说真话之五）》，《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⑩ 巴金：《二十年前》，《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08页。

⑪ 巴金：《文学的作用》，《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⑫ 巴金：《附录 我和文学》，《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⑬ 巴金：《“文革”博物馆》，《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03页。

⑭ 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⑮ 巴金：《怀念列文》，《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⑯ 巴金：《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

- 社, 2005 年版, 第 139 页。
- ⑮ 周祖谟:《广韵校本》“下平声卷第二”,“清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193 页。
- ⑯ 巴金:《说真话》,《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8 页。
- ⑰ 巴金:《说真话之四》,《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33 页。
- ⑱ 巴金:《我和读者》,《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47 页。
- ⑲ 巴金:《“从心所欲”》,《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45 页。
- ⑳ 巴金:《在尼斯》,《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78 页。
- ㉑ 巴金:《病中(四)》,《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60 页。
- ㉒ 巴金:《探索之三》,《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59 页。
- ㉓ 巴金:《探索之三》,《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59 页。
- ㉔ 巴金:《合订本新记》,《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 页。
- ㉕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 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 495 页。
- ㉖ 巴金:《附录 我和文学》,《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32、233 页。
- ㉗ 巴金:《“文革”博物馆》,《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03 页。
- ㉘ 巴金:《一颗桃核的喜剧》,《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0 页。
- ㉙ 巴金:《说真话之四》,《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34 页。
- ㉚ 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52 页。
- ㉛ 巴金:《怀念满涛同志》,《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32 页。
- ㉜ 巴金:《怀念胡风》,《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653 页。
- ㉝ 巴金:《解剖自己》,《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41 页。
- ㉞ 巴金:《致树基(代跋)》,《随想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60 页。
- ㉟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18 年版。
- ㊱ 巴金:《致树基(代跋)》,《巴金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13 页。
- ㊲ 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 93 页。
- ㊳ 巴金:《附录 我和文学》,《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33 页。

On Ba Jin from General Literary Vision

LI Yi, ZHANG Yu-t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PRC)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view is the general literary view, which also includes historic records, individual reflec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General literature can be documentary or has historic significance, which exists for people to live more meaningfully. Ba Jin advocated, “telling the truth”, “no literary skills”, and “writing for fighting with the enemies”. He viewed his *Random Thoughts* as a museum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n arch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tells his perspective of general literature. With general literary vision,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Ba Jin’s *Random Thoughts*. In fact, general literary vision is not only for Ba Jin’s *Random Thoughts*, but also the key for the works of other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Key words] Ba Jin; general literary vision; *Random Thoughts*

(责任编辑 王明丽/校对 维佳)